

# 论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改革的法国因素

王伦信\*

**[摘要]** 文章撷取了法国因素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影响的两个片断。其一在关于“大学区”制终止原因的讨论中,提到以往人们较少关注的视角,法国“大学区”设计中的教育集权制目标指向与蔡元培崇尚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旨趣相龃龉而被有意淡化,中、法“大学区”规模的悬殊等,都给中国借鉴法国经验带来了困难。其二是著名法国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作为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四名成员中唯一的科学家,对1930年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影响,如提升中学科学教育的比重,促进学校教科书本国化,推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等。

**[关键词]** 教育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大学区;科学教育;法国因素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主要在借鉴吸收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展开。由于受世界动荡局势的影响和外部不同模式现代化目标的吸引,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学习和借鉴对象发生多次转移。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是从学习日本开始的,日本是亚洲最早向西方学习和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国家,并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因此被视为亚洲现代化成功的典范,日本的学校制度和教育模式也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蓝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地位迅速提升,加上因“庚款”留美的学生陆续归国,他们以美国教育为典范,努力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教育开始了向美国借鉴的一个新时期,其最直接成果是1922年“新学制”的产生。1922年学制的两个重要内容,“六三三”的基础教育学年分段模式和在中学阶段提倡“分科选课”的综合中学,都是受美国影响的结果。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政府主导下开始对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应该说,这次教育改革已经注意到向外寻求多向的借鉴,并充分考量中国自身的传统因素。但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则表现出从美国转向欧洲的倾向,法国因素作为欧洲的一分子开始渗透到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来,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两位人物,一位是蔡元培(1868—1940),一位是保罗·郎之万(Paul Langevin, 1872—1946)。

\* 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62。

## 一、大学区试验及其终止原因的再认识

1907年,蔡元培怀着探究西学的渴望,以近40岁的年龄到德国留学,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后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革命党人的邀请下回国,被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至1912年7月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辞去教育总长后的蔡元培再次来到欧洲,其中1913年9月至1916年10月约3年的时间在法国度过。在法国,他与李石曾等人组织“勤工俭学会”,与法国友人一道发起“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中方会长,这些组织直接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1916年底,蔡元培回国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改革,拉开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大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以其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在教育界的声望,倡导在中国仿效法国建立“大学区”(académie),这对中国是一项新型的教育行政制度,也是法国因素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影响最强烈的一次。

根据1927年和1928年先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和《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中央政府不设立教育部,而设立“大学院”,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隶属于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设有大学委员会,为最高评议机构,有权推荐大学院院长及审议全国教育、学术一切重大方案。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确立大学一所,其校长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社会教育处、秘书处、研究院等机构。每个大学区设立有最高审议机构为评议会,由大学区内的大学校长、教授,中学校长、教员,小学校长、教师,县教育行政人员、法定教育团体、社会教育团体和学术界有名望且热心教育者各若干人组成。由此形成大学区内各级各类学校的行政管理系统。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成立后,蔡元培被推选为大学院院长。

“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浙江、北平(北京)三个地区试行。1927年8月,浙江成立第三中山大学区,江苏设立第四中山大学区。1928年2月分别改为浙江大学区和中央大学区。同年夏,又设立了北平大学区。但是,新的教育行政制度试行不到一年,即遭到普遍反对。中学教育界则抨击教育行政集中于大学而忽略中等教育的发展;地方行政长官则不愿意放弃本来属于自己的教育行政权。在北平(北京)甚至酿成大规模反对大学区制的学潮。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政府于1929年7月1日发布了停止大学区令,大学区制在试行不到两年后宣告终止。

民国教育改革史上的这段插曲,至今仍然引起研究者的频繁回顾和评论。在这些评论中,普遍将“大学区”制的终止归咎于当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不适当的改革时机,或者归咎于中国教育行政无法独立于官僚机构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规则)。但较少将中国大学区制的试验本身与它的借鉴对象——法国——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中国1920年代后期试行的大学区制与法国同时的大学区制在理念、背景和实际运作上存在诸多的不同。

首先,蔡元培倡导建立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是他教育独立思想在教育行政上的体现。中国的教育独立思潮兴盛于1920年代初,蔡元培是教育独立的积极提倡者。当时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并经常被侵吞挪用,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状态。为维持教育的正常进行,教育界首先发起向当局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要求政府指定固定的款项专作教育经费,进而形成内容广泛的教育独立思潮,如反对政党、教会对教育的介入等。教育行政独立是教育独立思潮一个重要方面,要求设立和政府机构保持相对独立的

教育行政机构,由专业教育人士主持,保持稳定而不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正是出于对教育被政党挟制的担忧,希望将教育行政系统从一般行政中剥离出来,建立一套独立的教育行政系统,这是他提出大学区制的初衷。但这与法国“大学区”制的设计的意图却大相径庭。

法国“大学区”制为核心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首先是体现了教育行政上的集权制。1799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时,当时法国的公立学校系统远没有建立起来,而私立学校又大都脱离政府的控制,成为教会和教士的势力范围。这对把教育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拿破仑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从1802起对教育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拿破仑1804年担任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后,即在1808年出台了实施“大学区”制的一系列法令。这项制度将法国所有教育管理机构、学校设施以及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的人员纳入到称之为“帝国大学”(Universite impériale)的系统。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帝国大学”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系统,“帝国大学”按区划分为若干大学区(1812年在法国本土设有27个大学区),设学区长一人。“帝国大学”大校长是教育最高行政长官。这样在法国就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帝国大学”大校长全面负责全法国的教育,各大学区的学区长负责区内的教育并向大校长负责。在教育行政中强调高度的服从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帝国大学校长绝对服从皇帝,“帝国大学”的其他成员要绝对服从大校长。<sup>①</sup>法国“大学区”制以后虽经历过多次改革,但基本维护了法国教育的集中和统一管理,是教育集权制的代表。

法国“大学区”制学区不隶属于地方行政的特点保证了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与同级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不直接接受同级地方政府的指令,也就避免了地方及与其相关的势力对教育的干扰。法国“大学区”制的民主和学术原则主要表现在法国各级教育行政机关都设置有对应的咨询协商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国中央设立有教育部,称为“公共教育与美术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 Arts),它是法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又设立有高级教育会议(Conseil supérieur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作为法国教育行政的最高咨询机构,“所有关于高、中、初各级教育的重大问题,部长必与之磋商,藉得到适当的解决”。高级教育会议的会员由来自于总统委任的公共教育代表,部长委任的私立学校代表,学术团体、大学机构,中、初等教育机构选出的代表等组成。在大学区一级,则设立有大学区参议会(Conseil Académique),会员包括有大学区校长、区视察员、大学各学院院长(科主任)、本区地方行政机关代表,中等学校代表等。<sup>②</sup>应该说这对防止教育行政官僚化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在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大学区制设计中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以及大学区“评议会”,均是借鉴法国制度而设立的机构。

法国“大学区”设计中的集权制目标指向,与蔡元培崇尚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旨趣相龃龉。在蔡元培影响下制定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大学区组织条例》等,也较充分地挖掘了法国“大学区”制中的民主、学术性内容以及在地方教育行政中的独立性原则。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说:“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薰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sup>③</sup>蔡元培力推“大学区”制,同样执此理念,力求教育行政与官僚体制相区隔,而对法国教育行政官员任免、行政原则中的集权倾向则采取了淡化的态度,这无疑难以迎合国民政府急切希望对教育进行管控的要求。

①参考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三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94—96页。

②参见罗廷光著《最近欧美教育综览》(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530—533页。

③《发刊词》,《大学院公报》第1期,1928年1月,第11页。

其次,一个较少被提及的因素,中、法大学区规模的悬殊,也给中国借鉴法国经验带来了困难。中、法大学区基本上都是以各自的一级行政区为划分单位,在法国为大区(région),在中国则为省级行政单位。1920年代,法国本土约分为20个大区,共设立有17个大学区,大学区的名称基本上以大区的首府命名,每个大学区一般仅有一所大学。而中国当时约有30个省级行政区,规划相应设立数量相等的大学区。由于中、法两国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每个大学区所涵盖的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约为法国大学区的数倍甚至十余倍。以江苏大学区为例,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400万(1928年),而当时法国本土人口为4000余万,仅江苏大学区的人口就接近法国本土人口。

学区过于庞大,不仅增加了行政管理的复杂性,也给学区内各大学之间关系的调整带来困难。当时江苏大学区内已拥有近十所知名大学,但按照法国当时的模式,每学区仅有一所大学,这样在确立原东南大学为江苏学区的中心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之后,其他大学的地位被人为矮化,大学区制遭到来自大学方面的抵触性反对就可想而知了。

## 二、保罗·郎之万对1930年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影响

大学区制的失利并没有妨碍国民政府由美国转向欧洲寻求借鉴的意愿,这一方面由于1920年代在向美国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教育领域中的自由主义倾向有违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希望加强对学校的管控,严肃学校纪律的方针;另一方面则与欧洲势力的抬头以及美国因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有一定关系。其中,1931年秋国联(League of Nations)教育考察团来华是中国教育由美国转向欧洲寻求借鉴的重要事件。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国联的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派遣了一个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的四人专家考察团于1931年9月30日抵达中国,在对中国教育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后,考察团于1932年发表了题为《中国教育之改进》(The Re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的报告书。报告书分析了中国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这对1932年后陆续出台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规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报告书的第二章《国家教育与外来之影响》中,考察团对中国教育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味模仿外国特别是美国教育提出了批评,这很快引起了数位美国教育界人士的强烈地反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由美国化拉向欧洲化的倾向”<sup>①</sup>的反映。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报告书提供的事实和建议提出了质疑。

但不管怎么说,报告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确实的。以中学为例,1922年学制受美国影响采取综合中学模式,报告书不仅指出了中国综合中学的弊病和名不副实,还对美国综合中学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美国制度及其细微的分科办法,其所需用之中学教师,必须在学理方面及实用方面均有高深之造就;就目前中国状况言,此种人才,极不易得。复次美国制度亦极不经济,盖分科既极细微,其必然的结果,即学生不免分成无数小组也。此种现象,中国中等学校大都有之。”<sup>②</sup>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分别公布了《中学法》《师范学校法》和《职业学校法》,次年又相应颁布了《中学规程》《师范学校规程》和《职业学校规程》,而《中学规程》规定:公立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不能再兼办其他职业科,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分开设立,综合中学最终被取消了。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建议对这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sup>①</sup>文宙:《美国教育界评国联专家之中国教育计划》,《中华教育界》第20卷(1933年)第11期。

<sup>②</sup>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年中文版,第102页。

在考察团的四名成员中,来自法国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他是成员中唯一的科学家。1932年7月20日国联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14届第5次会议,会议内容即是审议中国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会上郎之万的发言主要集中在科学教育方面,《中国教育之改进》报告中关于科学教育的部分应主要由他起草,内容集中在报告书的第三章,有关建议对中国科学教育产生了强烈影响。

报告书首先对科学教育提出了一般性建议。认为科学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对科学的功用价值的认识上,应更关注培养受教育者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一种区别于传统文化的实证的概念;科学教育应当与儿童的生活和人类的生活相联系;提高科学教育的实验环境等。除上述一般性建议外,在一些具体的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其一是针对当时中学科学教育普遍采用外语(通常为英语)教科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五四”运动后西学输入繁盛时期,许多西学原著来不及翻译,学术词汇的翻译分歧不统一的情况严重存在,所以在大学及专门以上学校的自然和工艺学科的教学中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对学生的外语要求极高,招生考试甚至直接采用外语试卷并要求用外语答题,许多中学为了应对升学考试教学中也直接采用外文教科书,并由高级中学延及初级中学。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甚至发文指令初级中学除外国语教本外其他学科一律禁止使用外文版教科书。<sup>①</sup>

考察团报告书中认为采用外语教材一方面是使学生不能透彻地理解科学:“如欲使新观念能深刻融化于儿童之脑中,历久而不灭,卒之正确有效,成为儿童所自有者,则此种观念,必须以儿童自己之语言灌输之,其所用之文字,必须为儿童以前一切知识所恃以构成之文字。故当施中等教授时,外国语言之课本,实有完全禁止之必要。”<sup>②</sup>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得不到促使本国语言臻于成熟和准确的训练机会,报告书说:“如用外国语言讲授科学,则其国语——无论口说或笔述——日见丰富与正确之利益,皆将丧失矣。”<sup>③</sup>1932年7月20日国联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的审议会上,朗之万曾专门就此特别指出:“一言一蔽之,教科学而不用中文,科学而终非中国物也。”<sup>④</sup>

考察团的建议得到了中国科学界的呼应,作为对改变这一现状的呼吁,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任鸿隽1933年曾就当时大学一年级和高中二、三年级普通理科教科书进行调查,发现除生物学科外,其余理科课本多用英文原版,其中高中二、三年级英文版教科书使用情况如下表:

高中普通理科二、三年级教科书英文版比重表<sup>⑤</sup>

学科	物理	化学	生物	代数	平面几何	立体几何	三角法	平面解析几何	总计
教材种数	167	166	90	80	43	53	78	61	752
英文版种数	117	105	19	67	28	39	65	56	499
英文版所占百分比	70%	64%	21%	82%	65%	74%	83%	92%	68%

任鸿隽的调查还发现“一个有趣味的事实”:“凡大学高中所采用的西文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版品,绝无欧洲各国的出版的教科书搀杂其中。”任鸿隽评价道:欧洲有些国家因为文字的关系,没有被关注尚情有可缘,“至于英国出版的各种理科教本,未必就无一本比美国出版的好些”,<sup>⑥</sup>为什么在调查

①《初中教科应一律采用中文本》,《教育期刊》1930年第35期,第75页。

②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第29页。

③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第30页。

④《世界文化合作会讨论改进中国教育报告书会议纪录》,北京: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5页。

⑤任鸿隽:《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科学》第17卷(1933年)第12期。

⑥任鸿隽:《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科学》第17卷(1933年)第12期。

中竟无一本被采择呢？就教科书一事，可见当时中国教育受美国影响之深。

在这种共同的认识下，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加快了编译中文科学教科书的步伐，其中中国科学社成为推动该项工作的最重要力量。但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又严重影响了工作的进程。

其二，报告书对中学阶段科学课程的比重偏低也提出了批评：“中学对于科学课程，似亦未有良好计划。在高中普通科，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占之时间仅及全数七分之一。”<sup>①</sup>按1929年课程规划，高中物理、化学、生物占总课时数15.99%，约为课时总数的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考察团调查是符合实际的。考察团的批评应该产生了一定影响，1932年和1936年两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时，高中阶段这三门课程的比重就有所提升，接近总课时数的18%，初中也由原来的8.33%提高到10%以上。<sup>②</sup>

考察团成员中朗之万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人物，在其他成员先期回国后，郎之万留至1932年1月14日。朗之万此次中国之行还加速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物理学会”（Chinese Physical Society）成立的进程。1932年8月22日中国物理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时，叶企孙（后被选为副会长）汇报了学会发起及筹备经过，他说：“近来国内研习物理学者日众……久有组织物理学会的酝酿去去年冬季，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先生来华考察教育，……也力言中国应组织物理学会，以谋中国物理学之发展。”<sup>③</sup>正是郎之万在华期间，中国北平（北京）的物理学界分别于1931年11月1日和12月13日举行了两次集会，起草了中国物理学会的章程。正是朗之万对中国物理学会的推动工作，郎之万在首界年会上被列为学会唯一的名誉会员，也是唯一的外国会员。

（责任编辑：蒋永华）

## French Factors' Impact on Educational Reform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Nanjing

WANG Lun-xin

**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wo issues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French factor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Nanjing. Firstly, in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the termination of “University District” System, the perspectives receiving less attention previously are discussed here.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the centralized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design of “University District” from France, which was at great odds with the objective (i.e., independent educa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proposed by Mr. Cai Yuanpei, was intentionally weakened. The second factor made it difficult for China to follow French practice was that China differed from France in the scale of “University District”. However, the famous French physicist Paul Langevin, who was the only scientist among the four members of educational delegation dispatch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1931, did exert some influence on China's scientific education in the 1930s. For example, he helped raise the proportion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promoted the localization of textbooks at schools, and gave an impetu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form;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Nanjing; university district; scientific education; French factors

① 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第118页。

② 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③ 《中国物理学会第一次年会资料》，《物理》1982年第3期。